

006233

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

西夏研究丛书

杜建录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

杜建录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

杜建录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

序

李范文

杜建录同志请我为他的新著《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作序。我知道他在写这本书,但没想到完成的这么快,望着厚厚的书稿,我思绪万千,不由得想起固原这片沃土。

1969年干校突然宣布我去固原“打农业翻身仗”。我被分配到古城公社店洼大队二小队“安家落户”,主人是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她把放柴禾的小窑腾出来,打了一座小土炕。尽管窑洞只有4米长,1.5米宽,但我却感到象“天堂”一样温暖,因为周围的群众对我的爱戴使我终身难忘。一个人当他恢复了人的尊严时,绝不会去计较什么物质的贫乏和环境的恶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固原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那里人民的勤劳淳朴、善良忠厚、热情好客的美德没有变,固原的干部、专业人才正是在劳动人民这种美德哺育下成长起来的。1981年宁夏史学会成立时我见到的袁伯诚、华世鑫、林立等都是才华横溢的中年学者。1987年第三届宁夏史学会上,我又接触到固原地区一批年轻有为的史学工作者,杜建录同志便是其中之一。他勤奋好学,专业基础扎实,发表许多有价值的文章,1992年又从固原师专调到宁夏大学专门从事西夏研究。由此看来,他很快完成这部资料翔实、观点鲜明的专著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我把书稿粗略读至掩卷时,深深感到课题选的好。西夏立国190年(1038—1227),如果从其先祖拓跋思恭建立夏州政权算起,则历时347年(881—1227),这要比同时代的北宋和南宋合起来还要多27年。一个偏居西北的王国政权竟立国如此长久,我想除了其本身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原因外,还与当时我国民族政权鼎立形势,以及西夏善于处理同周边民族及政权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因此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该书稿在写作上也有比较突出的特点:

第一,西夏是在唐宋地方民族政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作者把它的崛起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放在唐宋中央政府民族政策的大背景下来论述,这样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当时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脉络。诸如唐代党项羌的大迁徙,既是唐朝与吐蕃争夺西域失败的结果,又是唐代民族政策的产物;宋太宗迫使李继捧入朝献地,是在宋朝加强中央集权和基本统一南方,开始把经略重点北移的形势下出现的。同时作者又紧紧扣住西夏与宋、辽(后来是金)三维关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时代特点,指出夏辽结盟的基础是共同对付北宋,“夏宋关系缓和时,夏辽关系就紧张起来,而夏宋矛盾激化时,夏辽关系也随之和好。”西夏和南宋的关系也直接受到夏金关系的影响与制约。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和民族平等的原则,重视西夏与周边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毋庸讳言,宋辽金夏时期,我国大地上民族政权林立,它们在保持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的同时,还发生过无数次战争。如何看待这些战争?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便成为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不是简单地用正义的自卫战争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来概括它的全部内涵,而是用唯物地辩证地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战争的起因、背景、结果,特别是从阻碍了还是推动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多元

一体格局的形成上来考虑,这样,就把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另外,还设专章论述民族关系中最核心的问题经济文化联系,指出战争并没有阻挡住这一时期中华民族逐渐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各民族之间尤其是同中原汉族之间,不论在和平相处期间还是在发生战争期间,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这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使中华民族在多元的基础上逐渐走向统一,这是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大趋势和主流,它为元明清的大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该书的写作非止为学术而学术,将为促进新时期各民族团结,加强中华民族间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作出一定的贡献。

第三,史论结合。在治史方法上,有人强调史料,有人强调理论,能够做到史论结合则是最理想的。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比较好的将史料溶于理论之中,或者说把理论体现在史料之中,使观点和材料统一,让读者从史实叙述与分析中看出理论。

以上只简单地谈了几点阅后的感受。明年八月份首届国际西夏学讨论会将在银川召开,这是国际西夏学界的一次盛会。《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的出版,不仅是宁夏大学也是西夏故地宁夏对西夏学研究的贡献。相信以后在各级政府和有关单位领导的关心和重视下,将会有更多有水平的西夏学专著问世。

1994. 12. 28



目次

| | |
|-----------------------------------|-------|
| 序 | 李范文 |
| 绪论 | (1) |
| 第一章 宋代以前党项羌及夏州拓跋政权对外关系 | (13) |
| 第一节 早期党项羌与外界联系 | (13) |
| 第二节 党项羌内徙及其与唐朝关系的加强 | (18) |
| 第三节 五代时期夏州拓跋政权与中原 诸王朝的关系 | (30) |
| 第二章 夏宋关系 | (39) |
| 第一节 西夏建国前和北宋的关系 | (39) |
| 第二节 元昊、谅祚时夏宋和战与交涉 | (56) |
| 第三节 秉常、乾顺时期的夏宋关系 | (83) |
| 第四节 西夏与南宋的关系 | (96) |
| 第三章 夏辽关系 | (107) |
| 第一节 夏辽盟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 (107) |
| 第二节 夏辽破盟与夏辽战争 | (115) |
| 第三节 夏辽复盟 | (128) |
| 第四章 西夏与吐蕃、回鹘关系 | (136) |
| 第一节 党项羌内徙前后与吐蕃的关系 | (136) |
| 第二节 西夏对河西吐蕃的征服 | (140) |
| 第三节 西夏与河湟吐蕃的关系 | (142) |

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

| | |
|-------------------------|-------|
| 第四节 西夏与回鹘的关系····· | (152) |
| 第五章 西夏与金、蒙关系····· | (159) |
| 第一节 “天会议和”前后的夏金关系····· | (159) |
| 第二节 夏金友好关系的曲折发展····· | (165) |
| 第三节 夏金关系破裂与夏金战争····· | (170) |
| 第四节 西夏和统一前蒙古诸部的关系····· | (174) |
| 第五节 西夏与蒙古帝国的关系····· | (177) |
| 第六章 西夏与周边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 (186) |
| 第一节 与周边民族的经济交流····· | (186) |
| 第二节 与周边民族及政权的文化交流····· | (195) |
| 后记····· | (212) |

绪 论

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等民族组成的多民族政权,在其立国的一百九十年间(1038—1227),先后与周边的宋、辽、金、吐蕃、回鹘等国家和民族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在政治上它依违于宋辽(后期是金)两个大国之间,视其强弱为向背,后又积极笼络河湟吐蕃唃廝囉政权为盟友,显示出高超的外交手腕,对中世纪后期我国民族政权对峙格局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在经济上充分发挥自己畜牧业的优势,既同占据中原的宋、金展开全面的互补性交换,所谓“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计”。^①又利用地处“贸易华戎”的有利位置,大作中原与西北回鹘及其他远蕃的转手贸易,对这一时期各民族经济共同繁荣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文化上相互吸收,密切交流,逐渐形成了与中原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既有共性又独具特色的西夏民族文化,使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长河中,又增添了一颗闪亮明珠。

因此,从上述意义上讲,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不仅是西夏史

^① 《范文正公集·答元昊书》。

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近十几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和局部性的成果,发表了一些论文。本书是在此基础上,结合作者多年的研究体会,对西夏立国期间以及主体民族党项羌族对外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关系作一系统论述,力图展示西夏王国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地位和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过程中的贡献。

二

如果我们用粗线条划分,西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内徙前后党项羌及夏州拓跋政权的对外关系。党项羌内徙前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其居地曾一度处于吐谷浑行国领地之中。因而和鲜卑吐谷浑相互融合,并在融合中发展壮大起来。大约在北周时就开始摆脱吐谷浑的直接控制,随后活动范围一度深入到南山(今昆仑山)附近,和西藏高原上的吐蕃保持了一段相当密切的关系。但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党项羌对外联系与发展的重点不在西部及西南部,而是在东部,魏周至隋唐,其西部边界一直维持在叶护,没有能够再前进一步;深入到昆仑山附近的党项也没有在这一地区稳定下来,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党项羌在东部的联系与发展是卓有成效的,北周前后大批党项羌迁居松州,此后旭州、会州、金城等地都有党项迁居。631年(贞观五年)唐朝在河曲党项居地设置了六十个羁縻州,内附党项达三十四万口。634年(贞观八年)又在拓跋部居地设置了三十二个羁縻州,内附党项大首领被授以都督、刺史之类的头衔。早期党项积极向东发展,归附隋唐王朝,既表明他们向往中原先进的文明生活,又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同时也为唐代党项羌的大迁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党项羌内附的同时,吐蕃奴隶主政权从西藏高原上崛起,北上灭掉吐谷浑。党项拓跋等部为了免遭被奴役的厄运,在唐政府的帮助下,由青藏高原的松州迁往西北地区的庆州。既而吐蕃乘“安史之乱”,唐朝边防空虚之机,也深入到河西陇右地区,这样党项和吐蕃的居地又联在一起,并经常联合起来骚扰唐朝边境。出于拆散他们之间联系的目的,唐政府又把拓跋等部党项从庆州迁往银夏地区。

党项拓跋等部的两次大迁徙,都是从发生战乱的地方迁走。尽管经过千里跋涉,使他们的牲畜、财产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能够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下致力于生产,繁殖人口,比经常处于战争、奴役威胁下,终日民不聊生,毕竟得多失少。尤其是这些内徙党项居住地区,原来都是汉族人民长期过着封建社会生活并创造着封建文明的所在,这里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封建生产关系,都对他们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极大地推动作用,使拓跋部最终走上了建立西夏王国的道路。

881年(中和元年),平夏党项大首领拓跋思恭因助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封为夏州节度使,赐皇姓李,封夏国公,统辖银夏绥宥四州之地。从此夏州地区获得了定难军的称号,拓跋李氏成为名符其实的地方藩镇。夏州拓跋政权建立后,经五代到宋初,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比较友好的“臣属”关系。

第二阶段从李继迁起兵抗宋开始到乾顺弃辽附金为止,这一时期主要为西夏建国前夕对外关系和建国后夏、辽、宋三国鼎立关系。

北宋太宗即位后,江南已基本统一,于是便把经略的重心向北转移,在出兵北伐契丹的同时,利用夏州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迫使定难军留后李继捧献出世居的银夏绥宥四州之地,试图一举消灭夏州拓跋政权。结果适得其反,继捧族弟继迁利用党项人民反抗民族和阶级压迫心理,内联豪酋,外倚契丹,屡屡挫败宋朝的围剿,最

终于 997 年恢复“故土”。接着又向西发展,夺取宋朝西北重镇灵州。继迁被河西吐蕃大首领潘罗支射死后,德明承袭父志,南和宋朝,北收回鹞锐兵,西掠吐蕃健马,至元昊嗣位最终完成了对河西吐蕃和甘州回鹘的征服。

1038 年元昊称帝建国,为了使宋朝承认大夏国的“独立”,取得与其在外交上的平等地位,接连向北宋沿边发动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攻势。战争的结果,宋朝以每年二十五万岁赐,换取了西夏在名义的臣属。但这种名义上的臣属关系是极不稳固的,宋朝一直想制服或消灭西夏,不久便展开了长达百年之久的进筑横山行动,而西夏为了生存和发展,则发兵拼死相争。故终北宋之世,双方战争断断续续没有停止过。

和夏宋相比,夏辽关系要友好得多,双方除德明、元昊、谅祚时有过三次短暂分裂外,绝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结盟友好。辽朝曾三次将公主远嫁西夏,西夏则四时八节贡献不绝。夏辽结盟的基础是共同对付宋朝,一般夏宋关系和好时,夏辽关系就紧张起来,夏宋两国交恶时,夏辽关系也随之密切起来。夏、辽、宋三维制衡关系,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

在这一时期里,西夏还和宋、辽围绕河湟吐蕃唃廝囉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元昊、谅祚都曾试图在控制河西走廊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河湟战略要地推进;宋、辽两国特别是宋朝想将河湟吐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利用唃廝囉来牵制西夏;而唃廝囉则借助宋、辽的力量与西夏周旋。这种形势直到宋神宗熙丰变法期间才有所变化,当时宋朝用兵熙河,和吐蕃唃廝囉关系急剧恶化,唃廝囉为了顶住宋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便和西夏结成军事联盟。但由于北宋很快调整方略,加之西夏国力弱于宋朝,唃廝囉吐蕃从自身利益出发,始终没有和西夏建立起巩固的反宋军事联盟。

第三阶段从西夏弃辽附金开始到蒙古灭夏,即西夏王朝的后期。这一时西夏又长期和南宋、金鼎足而立,但外交的重点则在占

据中原的金朝。

公元十二世纪初,在大金帝国的猛烈攻击下,辽朝灭亡在即。一贯善于应变的西夏为了生存和发展,迅速改变外交政策,弃辽附金,和金人达成“天会和约”,以事辽之礼事金。夏金自“天会议和”后八十余年,除了中间有过几次短暂的分裂外,其余时间基本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十三世纪初蒙古帝国从草原上崛起,开始了漫长的征战,随着蒙古铁骑的南下,保持了八十年之久的夏金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209年成吉思罕兵围中兴府,金主卫绍王拒绝了西夏的求援,从此夏金关系破裂。“以致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弊。”^①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蒙古帝国乘其弊,前后只用了七、八年时间,就将夏、金相继吞灭。

西夏和南宋的关系呈现出断断续续的变化。南宋初年在金朝的威胁下,夏金两国出于共同求生存的目的,有过一些交往,但由于南宋国力远远弱于金朝,西夏只好顺从于金以求生存,没有和南宋达成实质性的抗金协议。1142年宋金“绍兴议和”成功,南北对峙局面正式形成,两国以淮水至大散关为界,陕西遂为金有,这样就把和战百余年的夏宋两国隔离开来。此后五十余年间,西夏和南宋几乎断绝关系,只有在“正隆南伐”、“西蕃之乱”、“西辽假道”三次事件中发生过极为短暂的联系。十三世纪初,蒙古对夏用兵,给金、夏、南宋三角关系以深刻的影响,夏金关系破裂,西夏先后五次主动约宋攻金,但双方缺乏合作的诚意,其中有四次没有结果,仅有的一次夹击金朝秦、巩,也是无功而还。

西夏与蒙古帝国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战争,在前后总共二十二年中,双方战争主要集中在1205~1209和1224~1227年两个时期,而在这两个阶段的中间即1209~1224年,除蒙古在1217年对西夏进行过一次报复性进攻外,总体上处于休战状态。这种战一和

^① 《金史》卷134《西夏传》。

一战阶段性的变化,与蒙古对外战略目标,以及西夏对外政策由附金御蒙到附蒙攻金再到联金抗蒙的变化相适应。

三

如何看待西夏与周边民族及政权之间的战争?西夏对外关系的主流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西夏自夏州拓跋政权起,和周边民族及政权发生过大小无数次战争,对于这些战争,很难简单地用正义的自卫战争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来概括它的全部内涵,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既要具体分析它的起因和历史背景,又要看它的结果,特别是阻碍了还是推动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党项羌人内徙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很快由原始社会末期过渡到奴隶社会阶段,家长奴隶主为了满足自己的占有欲望,除了对部落成员进行奴役与剥削外,最感兴趣的是对外掠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①加之唐代后期政治腐败,贪官、奸商上下齐手,对党项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勒索,更引起了党项羌人的不满与反抗。因此,这一时期党项的“叛乱”、“寇边”,既带有党项奴隶主贵族对外掠夺的一面,也具有党项人民反抗唐朝腐朽统治的一面。唐朝末年藩镇割据,节度一方的夏州拓跋政权也加入了它们之间的混战。

西夏建国前夕,和周边民族及政权之间军事斗争性质前后是有所不同的。起初,宋太宗抱着“混一海内”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迫使夏州节度留后李继捧入朝,献出世居的银夏绥宥四州之地,接着对李继迁势力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围剿。李继迁则利用党项人民反抗民族剥削和压迫心理,对北宋王朝坚决进行武装斗争。因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6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此这一时期的战争,是具有蕃部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和封建王朝内部分裂割据的双重性质,并以分裂割据性质为主。

然而,到了李继迁攻占灵州以后,这种分裂割据性质已不复存在。就当时民族斗争形势来看,“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①“积弱”之势彻底形成,宋太宗把主要精力放在防止统治集团内部有变和人民起义上,再也没有“混一海内”的思想。991年(淳化二年)8月他向近臣吐露了这一心声,“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②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后,宋真宗更是自欺欺人,借大肆封禅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③统治阶级的这种心态,也在灵州弃守问题上表现出来,当时许多大臣干脆主张放弃灵州,“退守环庆”。^④既然北宋没有能力完成对西北地区的统一,那么从李继迁到李元昊祖孙三代对河西吐蕃和甘州回鹘的长期战争,是属于局部地区的统一战争,是有利于中华民族发展的。

元昊称帝建国初期,为了达到“上下俱丰”^⑤和取得与北宋平等的外交地位,向宋朝陕西发起猛烈的攻势,其掠夺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元昊以后情况则有所变化,两国围绕横山地区的战争大多数是宋朝发动的,到徽宗时宋朝虽全部夺取了西夏横山之地,但它不仅和此后不久从金人手中赎回燕京一样,没有任何“统一”上的意义,而且还带有明显的“杀人掠地”性质。

夏金战争是在蒙古铁骑的进攻下出现的。两国统治阶级的短见,“以致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弊。”在以蒙古征服西夏为主的蒙夏战争中,蒙古贵族对西夏进行了残酷的

① 《宋史》卷8《真宗纪·赞》。

② 《长编》卷32 淳化二年八月丁亥条。

③ 《长编》卷67 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条。

④ 《长编》卷50 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条载杨亿奏语。

⑤ 《长编》卷124 宝元二年九月丁巳条。

征服与掠夺,造成了白骨蔽野、赤地千里的悲惨景象,西夏人民近二百年创造的灿烂的经济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我们无论从成吉思罕先攻夏,后取金,最后灭南宋的战略部署上看,抑或从这场战争的客观效果上看,蒙古灭夏战争是结束中国大地上民族政权林立,完成中国重新统一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具有统一性质的。

上述可见,数百年来夏州拓跋政权及后来的西夏王国与周边民族和政权之间的争战,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主观愿望与客观形势不同,有的属于反抗民族压迫性质,有的属于分裂割据性质,有的属于局部统一性质,有的属于民族自卫性质,有的则纯属统治阶级之间的混战。对于这些不同属性的战争,不加分析地说成是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战争,或者说西夏一贯好战,是带有掠夺性的非正义战争,都是不切合历史实际的。

西夏与周边民族及政权进行了大小无数次战争,是不是其对外关系的主流就是战争呢?回答是否定的。所谓民族关系的主流,我的理解是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总体上或本质上的方向,是走向分裂,还是走向统一,是推动了还是阻碍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战争固然是西夏对外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或内容,但它并没有阻挡住这一时期中华民族逐渐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各民族之间尤其是同中原汉族之间,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发生战争时期,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这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一方面使西夏社会经济生活和生产方式逐渐和内地接近,另一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夏经济文化,使中华民族在多元的基础上逐渐走向统一。可以说没有宋辽金夏时期在局部统一基础上的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交流,就没有元明清时期空前的大统一。

四

在宋、辽、金、夏诸国中，西夏的国力最为弱小，因此，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周旋于他们中间以求生存和发展，便成为其对外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

李继迁起兵后，虽偶获小胜，但屡遭重创，自感势单力薄，当时宋辽战争打得正为激烈，李继迁抓住这个大好时机，投附辽朝，被辽圣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李继迁自结好辽朝，如虎添翼，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斗争，最终迫使宋朝归还“故土”，恢复了拓跋氏在平夏地区的统治。

1004年李继迁中流矢身亡，其子德明遵照遗嘱和宋朝进行和谈。德明为了加大谈判的法码，取得更多的优惠条件，遣使契丹，得到辽朝的支持与答应册封；再度用兵西凉府，诱杀附宋的河西吐蕃大首领潘罗支。直到次年六月他才认为与宋朝讲和的时机成熟，“谋之张浦曰：‘先王遗命，应即表闻，缘降之太易，彼将轻我。今兵复西凉，国威已震，请之，此其时也’。”^①接着辽、宋便相继册封德明为西平王。此后德明为图自身发展，巧妙利用宋辽之间固有的矛盾，谨慎处理与他们的关系，不仅使宋辽两国都不敢轻视他，而且还竞相拉笼，或授以高官厚爵，或结为姻亲。

景德约和时，宋朝授德明为检校太师、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国刺史、上柱国、充定难军节度使、夏绥银宥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封西平王，食邑六千户，实封三千户，在头衔上超过辽朝所封。随后又不断加官晋爵，如1008年加中书令，益食邑一千户。

^① 《西夏书事》卷8。